

《百年潮》精品系列

中外之间

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姚鸿

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斯大林特使秘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中苏条约谈判纪事——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与我方的秘密接触……关于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传闻……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对话——中美“八一七”公报的产生……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轰动一时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1950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斗争中的一幕……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起因和终结……段苏权出使老挝记……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我军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在陪伴西哈努克亲王的日子里……美国曾计划在台湾搞“政变”……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一）……“反攻大陆”的梦想与美国的“限制”术——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二）

ZHONGWAI ZHIJ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AINIANCHAO JINGPIN XILIE

《百年潮》精品系列

中外之间

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姚 鸿
ZHONGWAI ZHIJIAN

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之间/杨天石主编;《百年潮》杂志社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12

(《百年潮》精品系列)

ISBN 7 - 5326 - 1932 - X

I. 中… II. ①杨… ②百… III. 中外关系—历史事件 IV. 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366 号

监 制: 张晓敏
统 筹: 唐克敏
责任编辑: 林益明
装帧设计: 姜 明 明 婕

《百年潮》精品系列

中外之间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293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 - 5326 - 1932 - X/K · 309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龚育之

《百年潮》出精品系列，编者邀我作序，说：“你与《百年潮》有三重关系：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所以，这篇序，你非写不可。”我答：“说‘读者’，我的确每期都读；说‘作者’，我有时偶尔也作。只是‘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说，不能认同。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负责人’，对主办《百年潮》却没有‘负’起‘责’来。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不过，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写序之请也不可辞。

写点什么呢？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不妨称之为《百年潮》创业的“三君子”吧。

第一位“君子”是胡绳。办这个刊物，他是创意者。他是我的老领导。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四十年后，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我又是他的副手，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送别胡绳归来，我写过几则琐忆，在《百年潮》上连载，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这里就不细说了。单说《百年潮》的创办。

胡绳认为，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流转，这种“体内循环”的情况应当改变。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可读性强的讲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四十年代他写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很强的通俗性，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现在，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百年潮》。

说“于是就有了……”，说得轻松，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组织班子、约集稿件、编成刊物，并且坚持下来，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担负起创办《百年潮》重任的，是郑惠。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第二位“君子”。

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老同事。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二线”。他熟悉党史，又熟悉编辑工作。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辑。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到了党史室，又先后主编过《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研究》。退到二线，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余热”。创办《百年潮》的建议一出，郑惠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说是支持，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从筹备到出刊，自筹资金（没有财政拨款），自配人员（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自办发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刊物要办出品位、办出水准，关键是稿件的质量。郑惠交游广，信息灵，思路宽阔，眼光敏锐，不但提出选题，介绍关系，布置编辑四处组稿，而且亲自登门约稿，笑嘻嘻地同你谈，跟你磨，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百年潮》一出世，就显得很有生气，很有看头，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郑惠年逾七十，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百年潮》社长了，还是很关心《百年潮》的工作，并已开始《胡绳传》写作的准备。没有想到，二〇〇三年春天，郑惠在完成《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之后，也因癌症逝世。我在《百年潮》上写了一篇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其中说道：“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所做的最有影响、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百年潮》。郑惠为这个刊物，真可谓呕心沥血，在学界赢得了声誉。而誉之所在，毁必随

之。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毛泽东与傅鹰》、《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都送给《百年潮》发表，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也就止于此了。”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

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第三位“君子”，是杨天石。郑惠为创办《百年潮》，罗致人才，请到了杨天石。郑为社长，杨为主编，好一对搭档。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这我是听说了的。但一直无缘谋面。他出任《百年潮》主编的时候，我和他还不相识。第一次同他见面，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这之后才有了交往，也并不密切，所谓“淡如水”吧。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他送给我他的著作：《海外访史录》、《横生斜长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关于蒋氏的一书，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百年潮》未能刊出，在《博览群书》和《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听说，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办《百年潮》对他来说属于兼职，他兼而尽职，兼而敬业，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人事有更替，事业多磨砺，杨始终如一，坚守岗位，杂志办到今天，杨是功不可没的。

胡绳、郑惠、杨天石三“君子”，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成就了一番《百年潮》的事业。

《百年潮》创刊，提出了八个字：“信史，实学，新知，美文”，我很欣赏。史要信，要真，要言之有据，不可信口雌黄；学要实，要下功夫，要言之有物，不可浮泛虚玄；知要新，无论在史料方面，或是在观点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文要美，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而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要考究，不可马虎潦草。《百年潮》赢得声誉，恐怕就在这“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八个字的追求上吧。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有批评，本不足奇。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针对的就是中

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相互切磋，平等交流，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争鸣应该开诚布公，而不是暗箭伤人。当然，作为一家刊物，不应讳疾忌医，而应从善如流，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更加满意。

《百年潮》取名“百年”，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也是最值得梳理、总结和反思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都应该总结和反思，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学习和总结历史，以观察和规划当前，古有明训。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

《百年潮》从一九九七开办，筚路蓝缕，十分不易。党史国史不易把握，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报刊市场竞争激烈，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人员经费捉襟见肘，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百年潮》的同志们在困难中坚持，到现在已近九年。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所谓“精品”，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信、实、新、美”之作。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读者见仁见智，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可以争鸣的。不过，无论如何，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挑选、整理、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可以说是《百年潮》创业的一道轨迹、一个印痕。这是不是也算对《百年潮》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

二〇〇五年七月

目 录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龚育之	1
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	王永祥	1
斯大林特使秘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邱 路	15
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金 牛	35
中苏条约谈判纪事——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丹 童	47
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青 石	60
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青 石	74
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	沈志华	92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	107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与我方的秘密接触	于化民	119
关于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传闻	熊向晖	140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	李向前	143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钱 江	161
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对话——中美“八一七”公报的产生	陶文钊	168
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	骆 威	186
轰动一时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	康矛召(遗作)	199

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

——1950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斗争中的一幕	王建朗	209
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转折点	钱江	218
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	张广华	226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起因和终结	李达南	245
段苏权出使老挝记	李杰	254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我军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	卓人政	269
在陪伴西哈努克亲王的日子里	康矛召(遗作)	280
美国曾计划在台湾搞“政变”	刘维荣	291
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	余科杰	299
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一)	牛大勇	308
“反攻大陆”的梦想与美国的“限制”术 ——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二)	牛大勇	320
《〈百年潮〉精品系列》编后话	杨天石	337

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

——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

王永祥

1943年11月下旬在埃及首都开罗，美英两大国首脑和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举行了著名的“开罗会议”。中国与美英同起同坐在会议桌旁共商世界大计，这尚属首次。一时间，中国报刊广布所谓中国进入世界四强的舆论。但是，正在一些中国人春风得意之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很快又在伊朗首都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餐桌旁，开始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了。这次会议的前夕，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密电斯大林，建议中国领导人参加该会。第二天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称“德黑兰会议”除美英苏三强之外，“吸收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考虑都应取消”。斯大林并把此意电告罗斯福。丘、罗对此均表赞同。此后，美英苏之间，就“交换条件”问题一直在秘密协商，但“四强”之一的中国，却始终未能与闻这一事关自身重大利益问题的任何消息。



194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专机于12时10分降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型机场。20分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专机也降落在此。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均前来迎接。苏联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英国国歌和共产国际歌。随后，

一列吉普车队驶往克里米亚南端的小城雅尔塔。沿途有苏联部队严加禁卫，而部队中有相当多的女性。

当晚 6 点，罗斯福等人抵达曾是沙皇别墅的列瓦基宫，并下榻于此。

2 月 4 日早晨，斯大林亦率员抵达，住在离列瓦基宫不远的一个小镇上。著名的雅尔塔会议开始了。

雅尔塔协定让中国作出牺牲，蒋介石派宋子文飞白宫见杜鲁门

2 月 8 日下午 3 点半，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会集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形势。随后，话题转到远东地区的军事问题。斯大林说他希望商讨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罗斯福表示，对其条件已有所知。斯大林要求在远东能有一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中国的大连。罗斯福称，虽然尚未和中国的蒋委员长讨论此事，不能代替中国人做主，但他认为，可有两种方式使苏联达此目的，其一是向中国租借该港，其二是使该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他本人倾向第二种方式。

斯大林又说，苏联要使用中国的中长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合称）。罗斯福说，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由苏联租借中长铁路以直接经营；二是中苏组成共同的委员会去经营。

斯大林说，假如这些条件不能达到，他将难以向本国人民解释苏联为何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回答，他需要找到机会和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斯大林称，现在尚无必要和中国商讨。他说：当苏联从西部（欧洲）战场上抽调 25 个师到远东战场上时，将是同蒋委员长谈此问题的好时机。斯大林又说：在我们三巨头离开雅尔塔时，这些经三国同意的条件，最好见诸文字。罗斯福又点头称是，说，我想此点可以做到。

在这次讨论中，斯大林没有忘记说这样一句话，即他主张：中国应团结于蒋介石周围，蒋委员长必须领导全中国。

2 月 10 日下午，在列瓦基宫，美英苏三方代表又有一系列的会议。斯大林称，大连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旅顺应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罗斯福表示同意。斯大

林又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较为适当。继而话锋一转说：“蒋委员长对外蒙古之现状亦应表示同意。”罗斯福说，此事最好与中国方面商谈。斯大林称：我是当事人，所以最好是罗斯福总统去与蒋委员长商谈。罗斯福说，考虑到保密问题，此事何时与蒋委员长商谈为好？斯大林回答：当我们认为时机到来时，将通知总统。罗斯福似乎还有话要说，但这时丘吉尔首相进来了，于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中断。

2月11日，在列瓦基宫，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上签了字。这个协定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条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是：

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保持；大连应列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联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将由中苏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

《雅尔塔协定》中还写道：三国确认，上述外蒙古、旅大港、中长铁路之各项协议，需征求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将设法获取蒋委员长之同意。三国领袖并一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联之上列要求将毫无疑义地得致达成；苏联表示乐于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协定，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之压迫下求得解放。

当时，美国人打的算盘主要是，让苏联人去和在中国的日本人打仗，美军主要用于占领日本本土，这样，美军至少可以少牺牲100万人，并且美军还可以在苏联的西伯利亚设立空军基地，供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B-29轰炸机之需。苏联人的考虑也颇具战略意义，此点后面将讲到；同时非常现实地立即向美国提交了一个总数约100万吨的需紧急支援的设备物资项目单。对此，作为罗斯福继任者的杜鲁门，在有无必要坚持《雅尔塔协定》的争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减少中美两国生命的损失，我所重视的只在如何使苏联尽快加入远东对日作战，其余均属枝节问题！

雅尔塔会议后所发表的公告，对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条件等有关内容无一字提及，但蒋介石却敏感地嗅到了其中关于东方问题的某种气味，遂拜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助了解内情。在白宫，罗斯福回告赫尔利说：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赫尔利却认定，已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是在真诚地撒谎。他终于说服了罗斯福让他查阅雅尔塔

会议的记录，并抄录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定。当他拿给罗斯福看时，罗斯福似有所悟，叫赫尔利去和斯大林、丘吉尔谈谈，看有没有弥补的办法。但此事刚刚启动，罗斯福于4月12日突然去世。

副总统杜鲁门继任了总统。杜鲁门的态度是：我们已经接受的义务必须去遵守；对凡是由罗斯福总统作出的规定，我们都将采取这一立场！无奈之中的赫尔利，遂用“纯系私人性质”的方式向蒋介石私下通报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被激怒了！即派宋子文于6月9日前往白宫面见杜鲁门，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规定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杜鲁门却回答说：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中的各种交换条件，便“不能不给以支持”。6月15日，杜鲁门训令驻华大使赫尔利，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向中国方面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指示赫尔利尽最大努力获取蒋介石的同意。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6月12日会见蒋介石的时候，已经向蒋通报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并提出了苏联关于进行中苏谈判的前提条件。这五项条件是：一、恢复旅顺港的租借，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的优越权利。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合办，共同使用。四、蒙古现状予以保持，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第五条是关于日本领土问题，此处不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宋子文曾提出，希望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同意使旅顺成为中、苏、美、英四国共同的海军基地，希望美英加入中苏谈判，等等，显然是要把美国和英国拉进来以扼制苏联。但6月18日，赫尔利从该国政府得到的训令却是：美国对于旅顺成为联合军事基地，对于参与中苏协定，概不同意。于是，中国政府只得于6月27日派员奔赴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

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争论激烈，斯大林老大不高兴

1945年6月30日，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其中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

外交部司长卜道明、外交部参事刘泽荣等，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当日傍晚，即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进行了礼仪性的短暂会见。

7月2日，谈判正式开始。

中苏谈判中，旅顺问题是焦点之一。按《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得恢复租借旅顺港并为其海军基地。但蒋介石对此反响强烈，他说，1898年旅顺曾被沙俄租借，中国人认为是民族耻辱，现在决不能再允许租借中国土地。谈判中，宋子文按此观点据理力争，并曾求助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却说，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特殊困难。因为美国打算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某些海岛，故无法拒绝苏联使用中国的旅顺。俄方态度也十分强硬，不仅要求完全控制旅顺，而且要求旅顺周围100平方公里以内均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

在双方争议不下的情况下，宋子文对斯大林说，蒋委员长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有租借地的名字出现于中国历史，中国方面愿意将旅顺港规定为中苏共同使用，而不是由苏联租借。斯大林表示，愿意照顾到蒋委员长的这一愿望，之后，遂推出了中苏共管即中苏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共同拥有的方案。宋子文坚持只能“共同使用”而不能“共同管理”，因为管理权事涉行政主权。争议既久，最终达成的协定是旅顺军港由苏联管理，军港以外由中国方面管理；军港之内苏方可自由决定一切。文字上的表述是：旅顺军港由中苏共同使用，其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共同管理之权交由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会谈最终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的协定文字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一句话，中方除争得了免去使用“租借”一词而代之以“委托”之外，旅顺实际上依然是苏联可随意支配的海军基地。

相关的大连问题，争议亦甚激烈。《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应成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海港的特别权益应予保障。谈判初始，斯大林首先提出以大连作为旅顺港的腹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要求。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条文据理力争，并私下与哈里曼协商。美国考虑到自己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自身利益，表示只能同意大连辟为自由港，而不能允许置于苏方单独

控制之下。宋子文遂感理壮，与斯大林争执。苏方也不相让，致成僵局。后来美国参与，7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与斯大林会谈时，从对美国利益影响的角度向斯大林提出，美国的主要考虑在使大连成为自由港。斯大林点头称是。其后的中苏谈判遂集中在对大连的市政管理权的争论上。最后的结果，是确定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并且在对日战争期间，大连要受旅顺军港的约束。最后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的规定中写道：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港要有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些就是苏联在大连的特殊权益。

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雅尔塔协定》规定应由中苏合组的机构共同经营，苏联的特殊权益应予保障。但中苏谈判一开始，苏方就提出中长铁路应由中苏共有并共同经营。斯大林说，要经营须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将来条约期满后，苏联将让出该铁路，由中国接过全部所有权；中国对该铁路的投资极其微小，且已得到了归还。宋子文反唇相讥说：苏联已经把中东铁路廉价出售给了日本。斯大林无言以对，只能一笑了之，避而不答，但他依然坚持所有权必须中苏共有，要求以苏联为主进行管理。斯大林说，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必须均由苏联人负责”。最后达成的协议，还是苏联的观点占了上风。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最后文本上，对中长铁路的有关规定中明确写道：中长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在对日作战期间，苏联有权在该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苏联凡经由上述铁路直运之货物，应免去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

谈判中，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苏联军队在参加对日作战并击溃日军后，何时从中国撤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惹得斯大林老大不高兴。斯大林明确表示说：这“很令我等不快”！他说，要求解放一个国家的军队于一定期限内撤退，倘若法国在美苏军队登陆之前就提出类似问题，我不知道会生出何种结果！但宋子文坚持己见。最后，斯大林答应在击溃日军两三周后，苏军开始从中国东北撤退，三个月之内撤退完毕。宋子文要求将这些写入条约，但被斯大林拒绝。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条约正文中不写明此点，但在条约的最后部分附上一个“记录”，其中写道：斯大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日军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军撤退一节，但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

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统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期间内完竣。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定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统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以完成撤退之期。

谈判中还提出了关于战胜日本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公私财产，作为战利品应作何处置的问题，但未及详细展开讨论。

斯大林说：要我们帮你们赶走日本人，就得接受我们的要求！

关于外蒙古的地位，是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

7月2日晚8点，当谈判进行到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讨论时，局面很快就僵持起来。《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宋子文认为，“现状”即指继续维持中国对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权地位，但斯大林却认为，“保持现状”即是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独立国家地位。他说：“外蒙古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古在1921年业已独立，我们希望此项事实，此种局面，中国方面应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宋子文说：我们对外蒙古“保持现状”的理解与美国的理解一致，就是认为保持中国在法律上的主权。斯大林说：所谓的中国主权，在外蒙古实际上已20多年不存在了。宋子文答道：即使50年我也不管，但这是一个法学学理上的问题。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直到10点半钟，只得不欢而散。

7月3日，宋子文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把昨天晚上他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英文记录稿给哈里曼看，并说：斯大林坚持把《雅尔塔协定》中“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这句话，解释成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他问哈里曼：当初签订《雅尔塔协定》时，罗斯福总统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他还要求哈里曼就此紧急电询美国政府，以确定如何解释。宋子文对哈里曼表示：除非外蒙古问题得以解决，否则，会谈将停止不前。

7月4日，美国白宫给哈里曼发来第三〇八号指令，其内容是国务卿贝尔纳斯给哈里曼的复电。文中称：杜鲁门总统认为，在目前中苏双边会谈中，美国政府如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款的解释者，那将是不明智的。贝尔纳斯接着说，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从“法律”上而言，外蒙古的宗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事实”上不能行使这一宗主权。贝尔

纳斯并特别叮嘱说：你应向宋子文表明，美国政府不能对《雅尔塔协定》中的文字作出任何官方的解释，你的非正式解释仅供宋本人知晓，不能在同苏联的官方会谈中应用。

得知哈里曼的答复之后，宋子文还是很高兴，更坚定了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7月5日上午，他再次会见哈里曼，并告诉他说：如果在外蒙古问题上不能达成协定，会谈将会破裂！但哈里曼却一再强调对达成中苏双边协定的期望和不能达成协定的“诸多不利后果”。

这次谈判之后，宋子文连日数次电告蒋介石谈判情况，特别是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争论，并就此事进行请示。依宋子文意见，外蒙古问题，不妨“允其高度自治”，甚至允其军事、内政、外交亦可“完全自主”，苏联也可以在那里驻军，但宗主权须仍属中国。可是，一连数日，宋子文均未能收到蒋介石的回电，不免有些焦急。其实，此间蒋介石正在西安而不在重庆，因而未及阅读宋的报告。但宋子文对此并不知情，于是，7月4日又再度致电蒋介石说：现正准备一切，并候钧座指示，以便继续谈判。万一斯（大林）坚持外蒙古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即只能终止交涉，钧意如何？乞核示。

此电既出，蒋之回复依然未到。宋子文只得商请蒋经国，请他以个人身份与斯大林进行会外的私下接触。在蒋经国与斯大林的非正式谈话中，斯大林先是很专注地听取蒋经国的意见，表现得甚为客气。蒋经国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多年抗战，为的就是国家主权，现抗战尚未胜利，而作为国家主权一部分的外蒙古主权却要分离出去，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承受的。他请求斯大林对中国政府的处境给以充分理解。但斯大林态度虽然温和，在实质问题上却丝毫不肯让步。他说：从历史进程看，外蒙古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它作为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已经20多年了，中国已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权；对苏联而言，外蒙古作为一个友好同盟，对苏联的战略因素极为重要，它是从远东进入苏联的“后大门”，一旦这个“后大门”被不友好的强国所占据，就会成为进攻苏联的跳板，1939年日本在诺门坎就这样干过；苏联政府为避免和防止日本或其他强国对自己的侵略，必须支持外蒙古独立！蒋经国依然据理力争。此时，斯大林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日本占领了中国，你们中国自己没有力量赶走它，既然要让我们苏联来帮忙，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其态度之强横，令蒋经国一时为之语塞。

7月7日晚11点，中苏双方代表再次谈判外蒙古问题，但僵局不仅未能打开，争论反而